

人文 / 历史 / 传承 / 创新

FUDAN
ECONOMIST
[仙舟客]

人文 / 历史 / 传承 / 创新

FUDAN
ECONOMIST
[仙舟客]
2018.01.14

第 5 期

仙舟客

[伉俪] 尹伯成、史遵明：经年岁月自难忘 / [创业] 薛中行：经邦济世 知行合一 /

[生涯] 盛子夏：及时捡起那颗符合当下期待值的麦穗 / [聚首] 赵扬：自由为马、理性为鞭的经济学家 /

[女性] 姜纬：漫步在好奇心与安全感之间 / [跨界] 李向民：中流自在心 /



仙舟客

漆琪生

《资本论》的传道者



“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微信公众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服务中心

电话：021-55665306 | 传真：021-55665306

Email: econalumni@fudan.edu.cn



卷首语

寒冬将至，但刊印的热度不消，《仙舟客》第5期面世，意味着这本校友刊物已经陪大家走过了两个多年头。

本期故事选取的人物，有学术泰斗，也有行业大咖。有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复旦经济学人对时代的回首，也有几代编辑老师对历经60年的学术刊物的集体回忆。

热爱，是贯穿他们故事的一条红线。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他们在无声的岁月里践行着对学术、对行业和对个人理想的热爱。

封面人物，中国第一代研究《资本论》的专家漆琪生先生，上世纪20年代，他东渡求学日本，潜心钻研《资本论》，学成归国。自1945年起，漆老在复旦大学任教，直至去世。其间，他夜以继日地写作《〈资本论〉大纲》，在“文革”中部分书稿不幸被抄走丢失，74岁高龄的他即使遭受“身心最大创伤”，也依然奋发，争分夺秒完成这部百万字巨作。漆老生前未能亲见《〈资本论〉大纲》全部出版，但他的毕生结晶，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他的学术生命。

经济学院另一位老教授尹伯成先生，自1956年本科考入复旦经济学院以来，他经历了文革中断学业、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等波折，他的一生和复旦紧密相联。至今，经济学院还流传着他“三进复旦”的故事。可以说，尹伯成教授锲而不舍的求学生涯，就是上个世纪经济学者在历史浪潮中上下求索的真实写照。

77级校友可谓是一特殊的一届。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们的经历迥然不同又富有传奇色彩。城市经济研究所的周伟林教授回忆那段芳华岁月，经济学老先生们德高望重、图书馆总需要争抢座位、女同学们素面朝天，深夜同学们要么打着手电筒在蚊帐里看书，要么在走廊和马路路灯下挑灯夜战……

96级校友、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商业决策总监盛子夏先生，5年前，他毅然辞掉在美国安稳的工作，回国加入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不断迎接中国当下互联网行业的潮起潮涌。

“文汇华章成锦绣，甲子华满又启程”。经济学院创办的理论刊物《世界经济文汇》，在今年迎来了60岁生日。《风物》栏目将带你回顾这本凝聚了几代复旦经济学人心血的刊物的历史。我们坚信，它将在陪伴一代代经济学人的道路中，再有一个辉煌的甲子。

2017年即将过去，新年的步伐越来越近。不变的是我们经院人前进的脚步。这一年，澳大利亚、重庆、天津、西安、南京、深圳、苏州、香港、广西等各地校友活动有声有色。92级校友回校参加毕业20周年活动、2004级世经所和世经系硕士校友毕业十周年返校相聚等等。复旦经济学院的校友们遍布五湖四海，但因为复旦二字，始终紧密相连。

亲爱的校友，愿你旅途漫长，只望来年聚首，笑容依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会长

编委会主任 |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张 军 Zhang Jun

编委会 | Editorial Board
赵定理 Zhao Dingli / 俞乃奋 Stephany Yu
陈诗一 Chen Shiyi / 刘军梅 Liu Junmei

执行主编 | Executive Chief Editor
王晓莉 Shirley Wang

责任编辑 | Editor
吕晓刚 Lv Xiaogang / 邱佳佳 Qiu Jiajia
朱家菲 Zhu Jiafei / 梁 冰 Liangbing
王 丹 Wangdan / 王 葳 Wangwei

记者 | Journalist
曹 柠 刘 浏 刘 郝 纪茗元 马恺昕
汤禹成 唐 雨 王 丹 王 葳 翁海峰
余 翔 杨 鑫 袁超颖 郑薛飞腾 周奕辰

美术编辑 | Art Editor
Mark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
Alumni Associatio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服务中心
Alumni Service Center,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CONTENS

[封面]

01 漆琪生：《资本论》的传道者
文 / 周奕辰、王丹、余翔



[伉俪]

17 尹伯成、史遵明：经年岁月自难忘
文 / 袁超颖

[创业]

27 薛中行：经邦济世 知行合一
文 / 袁超颖

35 蒲小川：复旦情结、金融人生、西部情怀
文 / 刘郝、唐雨

[生涯]

43 吴先满：复旦走出的富民先生
文 / 曹柠

53 盛子夏：及时捡起那颗符合当下期待值的麦穗
文 / 汤禹成

[聚首]

64 9215经济系：唱首诗给你听
文 / 马恺昕

69 赵扬：自由为马、理性为鞭的经济学家
文 / 纪茗元

78 常婧夷：常看云起时
文 / 马恺昕

85 郑定全：风雨砥砺，且行且歌
文 / 杨鑫

93 吴辉：拥抱不确定性的创业者
文 / 刘浏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暨77、78级返校纪念

99 朱民：时代成就人生（感恩复旦40年——朱民在恢复高考40周年暨复旦77/78级返校大会上的发言）
文 / 朱民

110 江祥根：1977年上海高考的最后一位“特许”报名者
文 / 杨鑫

127 历久弥新，七七一五（周伟林：忆往昔峥嵘岁月）
文 / 周伟林、王丹

[女性]

143 姜纬：漫步在好奇心与安全感之间
文 / 曹柠

153 林采宜：幸与不幸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文 / 马恺昕

[问学]

161 李连发：薪火相传，恢廓学风
文 / 郑薛飞腾

[跨界]

165 李向民：中流自在心
文 / 曹柠

176 梁元：漫步“进行时”的悠然诗人
文 / 纪茗元

[风物]

186 经济论道贯纵横：《世界经济文汇》的六十载记忆
文 / 王葳

[经纬]

194 全球校友会快讯



图 / 姜纬



漆琪生：《资本论》的传道者

文 / 本刊记者 周奕辰、王丹、余翔

上世纪六十年代，漆琪生写成《〈资本论〉大纲》第一卷，原稿三十余万字。但不幸的是，凝结他心血的书稿，在“文革”中被抄走丢失，对他而言，可谓是“身心的最大创伤”。但漆先生没有那么多时间懊悔愤懑，而是趁着生命中最后一段旅途，争分夺秒地想要完成最后的心愿。

漆先生的夫人回忆晚年时，半夜醒来，常常看到的是漆先生奋笔疾书的身影。1978年，漆琪生先生74岁。当他决定重新写作《〈资本论〉大纲》，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开始了。

1980年6月，漆先生因脑血栓住院，神智不清，幸而及时到东华医院得到有效的治疗，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在完成半个疗程后，身体刚刚有所恢复时，漆琪生就迫不及待地吵着要出院，他心里只有未完成《〈资本论〉大纲》这一件事。

时间紧张，漆先生的眼睛又不好，手稿的字迹未免潦草，夫人就每天对照手稿，一张张誊写。

次年春节，漆老先生又不幸摔了一跤，导致大腿骨折，住院两个多月。出院时，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要平躺静养，他却争分夺秒地写作，直着一条腿，一写就是半天。写至书收尾时，漆先生常常感到腰酸骨疼，写几个字，便要站起来捂着腰，疼痛稍微缓解，又继续伏案写作。他坚持要写完书再去医院检查。直到一天夜里剧痛，子女用一张藤椅将其抬下送往急诊，才发现先生的癌症已经扩散至胃部和肺部。在这样的病痛中，保持清醒的思路，笔耕不辍。用大女儿漆光瑛的话来讲，就是“咬着牙坚持”。

而这份坚持背后是漆先生与《资本论》超过50年的缘分。

· 少年而志于学

1928年，漆琪生第一次见到了河上肇先生。24岁的漆琪生这年顺利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这是日本最为久负盛名的学府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就在这里任教。

漆琪生就选修了《资本论》研究这一课程。在他的回忆里，河上肇先生年近五十，身形清瘦，上课不发讲义也不带稿子，讲课却是内容丰富，论点精确又不失趣味，课上不仅有本系同学，还有很多来自他系或校外的旁听者。

日本经明治维新，经济迅猛发展，走上了工业高度文明的资本主义道路，但社会太平盛世的表面之下，实则暗流涌动，

劳动阶层生活困顿，政府也未出台制度以促进社会平等，放任矛盾激化。河上肇教授在此背景下，决心学习经济学，经世致用。他早年学习资本主义经济学，又受儒学和人道主义的影响，于1916年写就著名的《贫乏物语》一书。此后，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研读《资本论》并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成为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几位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与建设者、如李汉俊、安体诚、资耀华，都受教于河上肇教授，受到河上肇教授思想影响的中国革命先驱更是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

而细究漆琪生先生有志于学的经历，和河上肇先生颇有些相似。他出生于农家，开蒙后的中学时代则恰逢大动荡



大变革的20年代初，参与到进步运动中，早早萌生对国家与社会的关切。1904年10月1日，漆琪生先生出生于原四川省江津县八镇乡红珊楼一个农家，祖父与父亲皆务农为生——先生对于农业问题一生的关注大概也与此有关。5岁开始读书，最开始只是在乡间半私塾式的小学习，9岁时正式进入八镇乡完全小学，1919年，正值进步运动涤荡全国，学潮风起云涌之时，漆琪生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高小毕业并考入江津县立中学。聪慧的漆琪生，颇得身为秀才并经商有产业的伯父喜爱。1924年，在伯父的资助下，他得以在中学毕业后远渡日本，相继就读于日本东京第一高等预科和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开始了《资本论》的阅读。

漆琪生加入了班里的同学组织的“社会科学联合会”。当时日本进步青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的影响，纷纷创办左翼性质的学生进步组织，“社会科学联合会”就是其中之一。

“社会科学联合会”与如今大学里的读书小组相似，大家每周指定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定期组织讨论会，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问题。漆琪生学习劲头很足，一边学日语，一边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接触到的第一本书就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经同学介绍，漆琪生随后便加入中国共产党。

“社会科学联合会”里，学术氛围非常浓厚。那时，同学们都普遍感到，如果想在理论思想上有所提高，就必须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必须深入地学习《资本论》。在这一风潮的影响下，漆琪生在阅读了一些《资本论》入门读物之后，便下定决心开始攻读德文原版的《资本论》第一卷。

最开始的学习难度是巨大的。一方面，《资本论》本身就博大精深，对于每一个初学者而言内容晦涩难懂；另一方面，对于漆琪生来说，语言关更是成了最大的障碍：既不懂德文，又不精通日语。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理解文义，仿佛要经过好几道门，才能抵达理论最本源核心的意义。



但顽强的毅力是破除一切障碍的利器。不懂德语，他便逐字逐句地查字典，翻译成日语，有时尽管阅读整整一天，也只读了一两页。过了半年时间，他才读完第一卷，直到第三学年，才终于将《资本论》全卷啃下来。

在京都大学，漆琪生喜逢良师，有了河上肇教授的指引，他对《资本论》的理解和研究愈发深入。

· 学者与斗士

然而，乱世无宁日，也就是漆琪生入学京都帝国大学这年，日本发生史称“三一五事件”，田中义一内阁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日本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文部省下令大学中驱逐“左翼教授”，河上肇教授被迫去职。河上肇教授离开讲坛后继续著书，并参与革命运动，即便被逮捕入狱，也未曾背弃自己的信仰。

而命运似乎也要使漆琪生如他的老师一般，为信仰，经历困苦，一生坚持。在漆琪生的女儿漆光瑛的印象里，父亲为人坚韧又温和，从不抱怨。她是从父亲的自传里才了解到那些早年的经历，“看了父亲的自传，真可谓颠沛坎坷。”

因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传播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思想，漆琪生曾一次入狱、三次流亡。学者与斗士，正是漆琪生30年代到50年代一体两面的身份。

这种奋不顾身在早年就可以得见。漆老先生在自传里讲过一段发生在中学时的故事——五四运动中，作为学生代表的他多次率领全县中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游行和检查日货等活动，遭校方记恨，在学期评定学生操行等级时，漆琪生果然被记大过一次。而当时，在校学生凡被记过处分三次，就要被勒令退学。

1930年，日本当局对全日本的共产党员进行大逮捕，漆琪生入狱三月。日警审讯多次，他拒不答复，最终辍学被遣返回国。

由于无依无靠，举目无亲，漆琪生最初在上海的日子是孤独的。在留日同学杜肃的帮助下，漆琪生认识了中国公学的校长马君武先生，并随后在中国公学任教，讲授“农村经济学”和“土地政策”的相关课程。他以《资本论》第三卷为基础讲授“农业经济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指出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在当时，公开讲授马列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甚至会惹来杀身之祸。但漆琪生出于对真理的追求，毫不避讳。他讲课深入浅出，深受学生的欢迎，课外时间里，他还开办读书小组和研究会，指导进步学生们读进步书籍，与同学们一



起学习、思考，深得学生喜爱。当时正值冯阎反蒋战争爆发，漆琪生趁此机会，在当时反蒋的报纸《平民日报》上发表各类化名论文，抨击南京政府的反动经济政策，也从此声名鹊起，引起同行关注。

从1931年7月至1933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漆先生受聘于暨南大学，前往该校讲授“农业经济”、“经济危机”和“政治经济学”等相关课程，还编写“农业经济学”和“商业循环”等课程讲义，多次主持“中国农业土地问题”专题讲座。他创新的授课方式，在学生中同样引起了巨

大的反响，许多学生对他的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有关方面的注意。

刚结束在暨南大学的教学工作，他便应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聘请，担任赣、湘、鄂、皖四省农村调查团团长，赴四省调查农村土地问题。在调查中，他们充分运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走访了许多穷乡僻壤，通过大量的访谈，搜集到了许多案例，加深了对农村土地和农村经济问题的诸多了解。调查结束后，他写了两份调查材料：《四省部分区域农村经济的



概括和症结》及《苏区农村土地问题》，各约30余万字，力陈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文化教育馆负责人出于政治考量，并不认同漆琪生的主张，但先生坚持不变。

1933年福州事变，反蒋抗日的福州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漆琪生即受邀加入财经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然而政府不久就在蒋介石的军队的反攻下垮台，漆琪生被民国政府公开通缉，流亡香港。化名潜回上海后，他以为报刊写文章为生。文中依旧直言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的错误之处。因当时拒绝了国民党陈立夫要其撰写唯心史观经济学文章的要求，漆琪生及其作品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国民党通知各报刊禁止发表他的文章。1935年开始，他化名在持志大学工作。1936年4月，因有人告密，学校急告漆琪生，当局将拘捕他。他只能即刻离校，逃至广州。

为了躲避迫害，漆琪生先后辗转云南澄江、四川重庆、广西桂林等地，一路颠沛流离，生活潦倒困苦，还要面对严密突发的搜查与逮捕。

重庆时期，漆琪生只能用绵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年幼的儿子患上肺炎，因无钱医治而夭折，他为此痛悔万分。此外，漆琪生本就有1000度的近视，加上一直耕耘学术，劳心劳力，用眼过

度，竟导致视网膜脱落，双眼暂时失明。尽管如此，他仍不忘抓紧一分一秒钻研学术，夜以继日地继续写作。无法用眼，便自己口述，妻子誊写。

新中国成立后，漆琪生终于得以拥有一段安稳的研究时间。他开始夜以继日地执笔写作《资本论》大纲，在六十年代写成此书的第一卷，手稿有三十余万字。不幸的是，凝结他心血的书稿，在“文革”中被抄走丢失，对于漆琪生而言，可谓是“身心的最大创伤”。据大女儿漆光瑛回忆，“那时候家里不知道被抄了多少次。”

“我最佩服我父亲的一点是他真的很坚强，也从来不抱怨。”聊起漆先生撰写《〈资本论〉大纲》的事情，漆光瑛感叹道。文革时代，知识分子最基本也是最看重的尊严完全被摧残，但这些事他从来不在妻儿面前讲，“这一点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人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要能够坚持下去。”

· 燃灯者

从1945年1月开始，直至1986年4月，除1950至1953年间的两次短期调职外，漆琪生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教授“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史”、“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货币学”和“金融学”等课程。曾担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他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人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上，来自各地的200名代表中，竟然有十分之一的人是漆先生的学生，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尹伯成于1956年考入复旦经济学系，据他回忆，“我刚进大学时就听说我们经济系有一批老教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漆琪生。”

不仅精研理论——在复旦的日子里，漆琪生经常在《新观察》等杂志上发布《资本论》方面的研究心得，并在报纸杂志上大力宣传和介绍《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漆琪生还注重将理论与国家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经济政策结合，并积极参加各种与经济相关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去。“首先是弄懂理论，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弄懂理论的目的，就是试图用理论的武器回答中国现实中的重大问题。”陶增衍1962年开始随漆先生攻读研究生，他记得先生这样对自己说。

50年代，上海是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镇。漆琪生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研究。在上海多种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和研究的文章。并向工商界人士做了多次演讲和报告，结合时事深入浅出地阐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1953年，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成立，漆琪生当选常委、副秘书长。他代表民建会积极筹办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并担任该校教务长，帮助上海工商界人士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

漆琪生也始终关切农业经济，他集中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理论，发表了《试论我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等诸篇有影响力的文章。

60年代，甘肃财经学院恳请漆琪生先生前往给老师们开设《资本论》专题讲座，“漆先生当时是国内研究《资本论》的老师中最出名的一位，在复旦肯定是最好的。”当时是经济系大三学生的陶增衍回忆道。漆先生当时已满五十六岁，早年的经历也对先生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而兰州的条件不如上海，学院领导征求漆先生的意见。面对传播《资本论》思想的使命，漆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陶增衍被选中作为生活与教学助理陪同漆先生一同前往，也因此与漆先生结缘，并随后成为漆先生的研究生。

《〈资本论〉大纲》一书第三稿的写作也缘起这次讲学。漆先生对《资本论》浸润多年，融会贯通，讲课时仅参考手上的提纲就可以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然而《资本论》一书艰深，很多学员在理解上还有困难，希望有讲义可以温习和辅助理解，便集中向陶增衍反映。然而，陶增衍知晓漆先生视力极弱，不能高强度用眼，编写讲义谈何容易。斟酌数日，他向漆先生提及此事，漆先生却极其高兴于同学们的认真，于是每次讲课后，都埋头书案，工作数小时，用钢笔一字一句把讲义写在一本黑皮本上，再由助教送去打字复印，送到学员的手上。

撰写一本《资本论》讲学大纲的想法在漆先生的心中扎根已久，学生们辛勤

记笔记的场景让漆琪生感触良多：如果编成大纲，学员们人手一本的话，在课堂上就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去听课、思考，而不用将时间浪费在逐字逐句地记笔记上，何乐而不为呢？有了这次讲课的讲义打底，回到上海，先生就开始夜以继日执笔写作《〈资本论〉大纲》。这一稿不幸于“文革”中遗失。先生锲而不舍，在“文革”后又从头开始。

最终完稿的《〈资本论〉大纲》一书近百万字，论述翔实，观点也有不少独到之处。例如，他不同意把“商品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混为一谈，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者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他坚决反对所谓“《资本论》第

图 / 在三州（中间为漆先生，左侧为陶增衍）



二卷没有详述剩余价值的问题”的说法，他以货币资本循环为例，详细分析了在资本循环中包含着剩余价值的问题。在分析《资本论》第三卷时，他特地指出，除了应重视马克思的利润和地租理论外，还应重视马克思的利息理论。

1978年，严法善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学生，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读研。“他名气很响。”他直接说道，“我当时研究生面试时，碰到一个哲学系的同学，一听我的导师是漆琪生，肃然起敬。”

在当时，漆琪生是复旦大学文科里的二级教授，在经济系里的职称是最高的。从一个小细节上就能看出来。据尹伯成

回忆，那时的条件不同于现在一名教授一个办公室，而是好多老师挤在一个政治经济教研室里，很多老师连办公桌都没有，漆先生却有一张桦木的办公桌，又大又重，抽屉也多，以至于后来重新调整时，连搬都搬不动。

漆琪生这样一个大牌的教授，对学生却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

严法善研究生的同班同学、漆琪生的另一位学生雍同回忆道：“更多时候，是我们去他家上课，上课的话题也比较宽松，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我们有什么问题就问他，他有什么问题就随便聊，严格地说，也不是上课。”



尹伯成从本科三年级开始，就与漆琪生有过接触，到现在漆老师上课的样子和腔调他都记得。漆老师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我估计有一千五百到两千度”，手里夹了一个皮的文件夹，文件夹里是早已发黄了的提纲。“他上课从来不看稿子，好像跟背出来一样。”尹伯成对这一点印象最深，偶尔要看讲稿的时候，漆先生会把那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摘掉，凑近了看。

在严法善的印象中，漆琪生先生显得很朴素，从来没有一天到晚西装革履，“蛮平易近人的。”待到学生毕业时，漆先生还亲自题词作为临别赠言，表达自己对同学们未来的期望，祝愿同学们前程似锦。

尹伯成记得，有一年自己空着手去漆老师家拜访，恰巧中秋节，师母热情地招待自己吃从来没有吃过的广式月饼，一个月饼一切四，他当时尝到了两种口味，“很客气的，我当时激动得不得了。”

漆琪生先生的家在徐汇区的泰安路上，和历史系的著名教授周谷城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由于年纪比较大，行动不便，不宜挤公交车，他一般是花3、4块钱乘坐三轮车改造的车子，相比于一趟至少十几块钱的出租车来说，还是很划算的。“他还是很节省的。”严法善回忆说。

但到了学术方面，漆琪生先生从不吝惜。严法善和雍同作为漆琪生先生的同一届的研究生，都对一件事情记忆犹新。在七十年代，几乎没有科研经费，漆先生为了做研究，自己掏钱托人从日本买进口的原版书回来。“那本书很贵，当时要四五百块人民币一本，这在现在是什么概念啊，起码是几千块钱一本书啊！”雍同感叹道。

在对学术严谨专注的同时，漆琪生先生还始终保持着学术上的宽容态度。雍同则认为，漆琪生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看得多了，他就知道任何问题都没有什么统一的答案，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研究的。做各种各样的探索，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接受的。“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禁区，是真正的学术自由。”陶增衍回忆自己研究生的生活，漆先生放手鼓励学生自己读书、钻研、写笔记，以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雍同在本科时，主攻的专业也是资本论。据他介绍说，我们中国人研究《资本论》，比较早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那一批人，也就是苏联专家培训出来的那些研究《资本论》的人。而漆琪生先生早年是在日本研究《资本论》，所以他跟人大那些研究者不是属于一种流派、一种风格的。

“引我入门的第一位老师，是属于人大那一派的，非常严谨，抠书本抠的很



细，但比较死板，对现实的关注可能差一点。”作为接触过两种流派的人，雍同解释说，“漆先生受日本留学经历的影响比较大，相对比较活络一点。”

来到复旦后，他接触到了一些当时国外研究《资本论》的新东西并用在了毕业论文里，这是一些在国内传统的老先生看来不能接受的东西。“我当时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我一直在不断请示漆先生，他一直是鼓励的，让我放开去弄，不要有束缚。”

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雍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差一点没通过”。事实上，他当时运用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方法，还有高等数学方程式来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完全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太多涉及。于是，一些研究《资本论》的老师就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全国《资本论》的研讨会上引起广泛讨论。

漆琪生和当时系里的另一位教授张薰华一起，请了复旦三位专家：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宋承先、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陈其人和蒋学模，一起来分析这篇论文。雍同回忆说：“我当时就以为会被‘枪毙’”，好在结果还算好，三位教授一致认为雍同整篇论文的论点没有问题，给了他很大的认可。

“这一切都要感谢漆老师，首先是他的认可，不然我可能就要换题目了。我自己的导师都不通过，那我怎么还能继续写？”雍同深感，对于那个时代，漆琪生做出这个决定亦非常不容易，“当时很多年轻教师都比较保守，认为马克思说过的话，是一句也不能动的。”

· 一家人

漆先生与夫人在他南下教书的课堂上相识，两人相差十岁。在解放前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夫人管家，家事样样操持。两人育有两儿两女，大女儿漆光瑛初中起就在上海华师大附中寄宿。在她印象中，父亲虽然很忙，但是对待孩子们总是特别宽容慈爱。

去外地开会时，他会给女儿带礼物。“我那时候喜欢扎辫子，他就从北京给我带景泰蓝的花夹子。”她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还从房间里拿出一个父亲特地为她刻制的图章。玲珑可爱的模样，是个小巧的华表造型，这是漆光瑛最喜欢的一物。还有王府井街上各式各样的小猫小狗，最是孩子们喜欢的玩意儿。夏夜全家人一起纳凉时，漆先生会给孩子们讲故事。在漆光瑛的印象里，父亲的记忆力很好，完全不拿书本，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很吸引人。“我对《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名著最早的接触，都来自我父

亲。”

作为父亲，漆琪生性情温和，是位“慈父”。漆光瑛说自己初一时算数不太好，“鸡兔同笼问题怎么都搞不懂，考试还挂了科”，但父亲从没有发火责骂，而是耐心地去教她怎么去理解。战乱时候，老家几位亲戚家的孩子也一同寄住在家里，漆琪生更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倍加爱护。

漆琪生喜欢游泳，还有一系列文化娱乐活动，少数工作不忙的日子里，他便会带着孩子们去当时位于泰安路的文化俱乐部去游泳、看文艺表演。芭蕾舞和女高音演唱会，都是漆光瑛印象深刻的节目。

漆琪生始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和意见，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们。他会用自己的经验，给孩子们一些理性的建议和帮助。漆光瑛对天文很有兴趣，中学毕业时向漆琪生表达了自己想进天文系的想法，漆琪生并没有当场否决她，只是笑笑对她说“天文对数学的要求很高哦”，后来漆光瑛便“知难而退”了。

父亲对漆光瑛最大的影响，除了耳濡目染使她走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外，漆光瑛说，父亲始终强调女孩子要先立业再成家，所以鼓励她去考研究生。但在研究生选导师的时候，为了避嫌，漆先生不希望女儿选自己做导师。漆光瑛回

忆说：“后来跟着陈观烈老师，也是非常不错的老师。”漆先生的教育理念比较宽容，算是一种在原则之内，让孩子们“放任生长”的理念。漆光瑛和二妹妹都顺利地进入了复旦大学，后来漆光瑛也秉承着父亲那样的教育理念，自己的孩子也考入复旦大学，可谓是一门三代复旦人。

平日里，漆琪生喜欢种种花草，练练书法。漆光瑛说，父亲喜欢搜集帖子，曾经和永宝斋的老板熟识，空闲的时候都会去“淘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有时候爱字帖到痴迷地步，惹得母亲都有意见。以前家里有一个书房，除了书之外，存放的都是各类书法名家的字帖，但都在“文革”中被抄走。其中，漆老最喜欢的是王羲之的书法。在“文革”后，由于患脑血栓，身体不好，他坚持用练字来转移注意力，并锻炼自己的心性。“练字，就是可以锻炼一种坚韧的品格，更可以让人保持乐观昂扬的态度。”漆光瑛这样说道。

留洋学者，复旦名师，中国第一代研究《资本论》的专家，《〈资本论〉大纲》的撰写者。。。漆琪生一个个令人敬佩的标签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披荆斩棘。

1986年，时年82岁的漆琪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去世之前，他最念的还是三卷本《〈资本论〉大纲》，还计划着撰写一本马克思农业理论的著作、一本研究资本



主义工商业和社会改造理论的书，以及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积累理论的书。

三卷本的《〈资本论〉大纲》，在漆琪生先生去世后的第3年，才得以完全出版。尽管先生无法看到，却也不负他生前所

愿。这毕生结晶为他与《资本论》超过五十年的缘分画上完满的句号，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他的学术生命。 [鉴]



尹伯成、史遵明：经年岁月自难忘

文 | 本刊记者 袁超颖

虹口区衡水路一侧，尹伯成、史遵明两位老师的住处与四川北路公园只隔一条马路。退休多年来，两人常常一同前往公园晨练、打太极拳锻炼身体。

八十一岁的尹伯成依然身体健朗，说起话来抑扬顿挫，有一股冲劲。回顾往事，他笑着对记者说：“我们结婚到现在五十多年，虽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可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都是普通老百姓，过得是平平淡淡、实实在在的生活。”

尹伯成、史遵明夫妇，一位是三入复旦、潜心学术、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老同志，一位是朴实无华、妥帖从容、执教中学多年的数学教师，二人皆十分亲切随和，没有半点架子。这段尹老口中“平淡”、“实在”的生活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他们依然能清楚记得其中点点滴滴的小事，伴随着岁月更迭愈加难以忘怀。

· 旧时往事

尹伯成比史遵明年长四岁。1956年，尹伯成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因读书读得晚，五年后本科毕业时已经虚岁26，在农村老家算得上“大龄未婚青年”了。他笑言，当时家里催他娶妻，自己心里也很着急。无奈工资收入低，经济条件较差，负担又重，不得已一直拖着。虽然有人也介绍了几位，但都嫌他“一穷二丑”。当时他想自己好歹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怎么落到这个没有人要的地步？但上天没有欺负他。

1962年秋天，尹伯成在苏州市第五中学任教时，认识了自己办公室一位老教师史家琛先生的女儿史遵明。史遵明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在齐门中学（后来的苏州第三十九中学）教数学。两人走到了一起。“患难见知己，她全家人都没有嫌弃我穷，在人生低谷时能遇到这么一个同志不容易。”尹伯成感叹道。两人交往了一年有余，于1964年春天成婚。

1964年婚后没有多久，在史遵明全家支持下，尹伯成考取了复旦经济学说史专业的研究生，离家赴沪继续读书。这是他二进复旦。夫妻二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苏州，异地而居。史遵明只身住在苏州工作的学校里，一边上课教书，一边抚养刚出生的儿子。当时学校条件很差，没有自来水，每天早晨五点钟便要起来洗尿布，把孩子送到附近人家帮忙照看，自

己才能去上课，下课后再去接回来。生活确实不易，尹伯成也格外牵挂家里，每年节后要回复旦时，“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1978年，尹伯成三进复旦大学读书，不久就留在复旦经济系任教。两年后，系领导为其争取到了一个调动教师家属进上海市的指标，史遵明得以从苏州调入上海，到吴淞培新中学任教。一家人总算团圆在一起。

尹伯成告诉记者，“婚姻是一种特殊的、唯一的、永远存在的相互关系”。夫妻之间既要永远相互记得、相互体贴，也要相互尊重和理解。

新婚时小家庭经济很拮据，夫妻二人挤在史遵明父母家的一间小厢房里生活，尹伯成身上的棉毛衫破得不能穿了，史遵明只能给他一个洞一个洞补好。一次，系里派尹伯成到山东东营的华东石油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班级授课，结课时拿到了140元的酬劳，他原本坚持上缴给经济系，张薰华主任对他说：“这是你劳动所得，应当你拿。”尹伯成使用这笔对他而言天文数字的“巨款”给妻子买了一件毛呢上装。在艰苦的岁月里，这是史遵明“生平第一件上档次的衣服”。

尹伯成眼里的妻子朴实醇厚、胆子小，“树叶掉下来都要吓一跳”。而史遵明则嗔怪丈夫做事粗心。尹伯成大大方

方承认：“我这人心比较粗，衣服放哪里都不知道，所以都是她管，都要问她。”这位只会上课写文章的教授同志也有孩子似的顽皮。有一次难得下厨房，却烧焦了锅子，被妻子批评，他不免笑嘻嘻地强调，“别说了，我心里也很难过的嘛”。



· 三入复旦门，一生复旦人

至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还流传着尹伯成教授“三进复旦”的故事。成长在特殊的年代里，尹伯成与复旦的交集多了些传奇色彩。

1956年，21岁的尹伯成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这是他“初进复旦”。五年后本科毕业，分配到苏州丝绸工业学院任教。一

年后学院调整下马，他调到苏州市五中。1963年春，高校恢复研究生制度，尹伯成一考不中，次年再考，终于进了复旦，师从吴斐丹教授读经济学说史专业研究生。这是他“二进复旦”；后来，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尹伯成重回苏州市五中工作。1978年春，研究生制度再次恢复，老同学洪远朋、周建平给他“通风报信”，时任系主任的张薰华教授也鼎力支持，已经虚龄43的尹伯成因此“三进复旦”，继续攻读经济学说

史专业。

1980年，尹伯成研究生提前毕业，正式留在复旦经济系任教。作为“文革”后全国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这一消息还登上了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从此后，我再没有离开过复旦。”尹伯成说。

在复旦，尹伯成先后担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1993年起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此期间，复旦的老教授们为人处世、治学教学的谦逊和认真深深影响了他。尹伯成说，他所熟知的大师级的老先生们做学问极为认真，但从不自吹自己的成就，人的名气也不是靠媒体炒出来的，而是要靠实实在在的真学问。经济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蒋学模教授指导他修改文章时叮嘱他，写文章要深入浅出，不懂的东西千万不要写，自己弄懂的东西也要用别人能看得懂的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一直记得蒋老师的话。”尹伯成表示。他在之后编写教材以及给学生上课时，都要求先自己理解，尽量做到通俗易懂。

尹伯成一直记得自己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在本科期间，苏步青教授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等到他“三进复旦”并留校工作时，苏老先生已经成为校长了。后来一次在学校路上相遇，苏老一眼就认出他来，说道，“你好像经济系的。”尹伯成说了自己名字，苏老点点头：“哦，有印象。”尹伯成大为感叹。一位如此大名鼎鼎的权威和领导对下面一位普通同志的情况竟如此熟

悉，是他万分想不到的，也因此备受感动和激励。

“我达不到这些老先生们的高度。”尹伯成诚恳地说，“我学问没有他们高，做人也够不上他们那样的高风亮节，但我始终想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无论在当初经济学系还是后来的经济学院，尹伯成始终坚持“求学”和“耕耘”，即便退休后也勤耕不辍。他将精力倾注在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工作上，出版了《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西方经济学说史》等教材，深受有关高校师生欢迎。

尹伯成十分感念复旦、感恩经济系，他动情地表示，“经济学院给了我一切。”在自己80岁的纪念画册里，尹伯成回顾了自己“求学与耕耘的一生”，其中就着重讲述了在复旦经济系的际遇。

他在纪念册末尾如是写道：“只是慢慢隐去，复旦，我永远不会离开。”

· 为人师、育桃李

经济学院2000届毕业生、经邦集团董事长薛中行与尹伯成教授非常熟悉。他回忆称：“我们读书的时候已是经济学领域十分辉煌的时代。那时尹伯成等教授治学的严谨和专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生眼里的尹教授待人真诚、做事认真。“我做事情喜欢一步一个脚印，说一是

一，说二是二。”与尹伯成交谈，能够感受到先生身上几十年如一日的严谨，有自己的态度和坚持。他说到新闻系陈望道、王中等老教授时，十分敬佩他们踏实为学，及至如今看到报纸上有些年轻记者写文章犯了“得”、“的”、“地”不分的常识性错误，很是痛心，批评他们“不够踏实”。后来尹伯成担任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虽非他主业，也是心血不减，撰写了大量研究房地产经济的文章，指出我国楼市目前供给计划性和需求市场性的严重不对称，提出需建立长效机制、减少反反复复的临时调控。“我一直是坚决反对炒房的！”谈及国家社会的发展，尹伯成不自觉

又带上了那股年轻人的冲劲儿。

1993年，尹伯成成为博士研究生的指导老师。孔爱国、张立林是他最早的两位博士生，前者留校并成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著名教授，后者是原农行资产管理部的总裁，今年年初刚刚升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上任第二天，张立林就发短信向尹伯成报喜，同时感谢他“尹老师，都是您传道的结果”。他十分欣慰，笑容写在脸上：“学生做得好，我也高兴！”

学生们在经济学领域做出成就的大有人在，有做教授的、大学校长的、集团和公



图 / 尹伯成复旦求学照（右二）

司老总的、银行行长的、研究所所长的等等，真是不少。尹伯成骄傲地称：“他们是我最大的财富和资源。”有时候去外地高校开会，常有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争先恐后地要与尹伯成合影，令他哭笑不得，说“我一个老头，拍出来很难看”。但他们说，“我们都是看您的书考上研究生的，都是您的粉丝！”但他一直认为“并不是自己真的有什么本事和水平，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给了自己机会，也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同样为人师者，史遵明也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我的学生们都是初中生，年纪虽然小，但他们也有很多记得我的。”史遵明说。她离开苏州调来上海后几年了，当年齐门中学的学生们举行毕业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还千方百计找来她的联系方式，邀请她参加。

在上海家中，史遵明要打理家庭，还多年服侍患有眼疾的老父亲；在学校，她还要带学校里的新老师，给初三学生上课、批改作业，辅导他们初升高的学习。中学里有早读课，交通又不方便，史遵明每天要起大早、走远路去学校，负担不可谓不重。尽管压力很大，但她依然很好地平衡了家庭和事业，在学校里、区里都上过公开课，反响都好。

退休后，史遵明没有闲着。现在两人的小孙子正在读小学，每天放学请钟点工接回家里，她便重新“披挂上阵”，担任小孙子的老师，辅导他做功课。二老一小，其乐融融。尹伯成看着也十分喜欢，“看到第三代健康成长，我心里充满天伦之快乐。”



· 少年夫妻老来伴

三年前是尹伯成、史遵明的金婚纪念日，一家人拍摄了全家福，他们两人抱着小孙子坐在儿女们中间，满脸笑意。尹伯成非常珍爱这张照片，感叹道：人一辈子不容易，能长命百岁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夫妻间的情感却是实实在在的。“人老了，父母一走没了，子女一长大也飞了，只有俗话里讲的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才是能陪伴自己一生的人。”

从岳父母家的小隔厢，到复旦大学附近中心村的一间房、复旦第五宿舍里的两间房、水电路上的四室两厅，最

后到衡水路上四川北路公园对面这套二百多平米的大房子，这是他们年轻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不论经济条件如何，也不论住在何处，尹伯成和史遵明始终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并肩走过半个多世纪，并且还将更久。

尹伯成望了一眼妻子，由衷地说：“跟她生活一辈子，我从来不愧悔，她给我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使我能够安心做学问，好好工作。”最穷的时候，一双儿女每天早晨只能一人匀半杯牛奶，尽管如此，史遵明依然支持丈夫在复旦的学业，从不埋怨。



○ 图 / 70岁尹伯成

“他这个人就是蛮粗心的，家务不会做，其他还可以。”史遵明想了想，笑着如是评价自己的丈夫。“但是我比较靠谱，靠得住！”尹伯成的孩子气又上来了，急着补充。

如今，两位老人不时也相伴出去走走，平日早晨，也会和“拳友们”一起去门口小公园打太极拳锻炼。此外，史遵明忙活家务，准备一日三餐，喜欢文艺活动的尹伯成则吹吹笛子、拉拉胡琴、读读唐诗宋词，生活过得还有些味道。“他可喜欢读什么千家诗一类了。”史遵明指指丈夫说。“我有天读到苏东坡写的江城子，感动得不得了！”说到兴起，尹伯成一口气背出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啊呀，写得太好了！”他啧啧称赞。

尹伯成说自己要“老有所健，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他还关心着国家大事，偶而还给报纸杂志写点东西，

同时还继续修改教材，从事些研究。史遵明有时候劝他：“再不要去写什么书、什么文章，作什么讲座、参加什么会议，搞什么评审等等了，怎么不留点日子给自己过过？”尹伯成则表示，“就像劳动惯的农民闲了会发慌一样，我闲了也不舒服。”他喜欢曹操那句著名的诗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并在自述中提到，“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不可能有这么大雄心壮志和精神境界，但我总认为，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应把毕生精力贡献给社会。”

“尽管我不知自己究竟能活到几岁才离开世界，但是，只要活着，就得学习，不断学习，让知识不断更新，让思想与时俱进，在工作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史遵明唯有一如既往地支持丈夫。“不然我没有饭吃啊！”尹伯成不忘调侃。

提到这段发言，尹伯成笑着说：“本来叫我准备发言二十分钟，可惜轮到我讲时已经是中午了，我怎么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听呢？只好简短些。”他原本还要引用王焕之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来勉励学生。不免使人感叹，尹老真是性情中人。

· 诲人不倦

今年经济学院的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尹伯成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寄语年轻人一要树立志向、二要学好功课、三要锻炼身体。“作为一个老头子……因为现在我老师还在，所以我还得夹着尾巴做人，老师走了，我和同学就是老大了！”向来幽默的尹伯成一讲话就逗笑了一片。

“我82岁了，个人认为，现在我们是生活在最好的国家、最好的时代。”尹伯成教导学生要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风格情操，“复旦的学生要有复旦学生的样子！”

茶水续了再添，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信条分享给记者：“多看多听多思考，关键在思考。做人做事做学问，首先是做人。”

（本文系记者对尹伯成教授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尹伯成，复旦大学经济系1956级本科，1964级研究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历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以及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外国经济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 图 / 尹伯成





薛中行：经邦济世 知行合一

文 / 本刊记者 袁超颖

薛中行，现任上海经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已过不惑之年的他看上去仍然精神抖擞，面容大有《易经》里“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风范。

身为董事长，薛中行每天早晨七点半就早早到达公司，晚上则极少出去应酬。事情再多，每天雷打不动要抽出三小时读书。不仅研究经济，也精研中西方古典哲学。他说自己极认同曾国藩说的一句话——“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

他也确实将“贵有恒”的哲学贯穿到17年的创业生涯中。

· 股权激励的拓荒者

1997年，薛中行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就读硕士。硕士阶段，他师从复旦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张军，张军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产权理论，即企业的所有权。薛中行在研究生阶段一直跟随张军教授，研究怎么推动中国企业所有权的发展。薛中行介绍说，“马克思从国家层面讲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我们则是从微观层面看待所有权结构问题，探索企业股份能不能从‘单干模式’发展为‘共享模式’，也就是说，股权到底能不能为员工所分享”。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市场经济初步发展，众多企业家在身份上已经完成从个体户到公司管理者身份的转变，

但思想上依然囿于“家族性质”。对此，薛中行犀利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遇到的一个很大瓶颈就是只有老板一个人在努力。企业长不大的根本原因是老板只注重私利，总想着企业是个人的，境界、格局都太狭隘。”

薛中行说，如此一来，企业家和员工之间不能形成向心力，整个企业的干劲就必然受到影响。

“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吸引不到人才，企业就会被淘汰。老板再聪明、再厉害，也没有三头六臂，他必须依靠员工。”薛中行认为，怎么把“一个人的企业”变成“所有员工的企业”，使员工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于企业家而言，极为关键。转变的一个方法便是股权

激励——让企业里的能人、智囊团分享该企业的所有权。一个例子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创办8年之时，就有总人数65%的员工拿到股权激励，而身为这个全球最大零售平台的企业董事长，马云所拥有的股份只有8%。2017年10月10日，阿里巴巴股价上涨逾1%，市值升破4700亿美元，超过了亚马逊。“阿里巴巴就做得很大，成长得很快。”薛中行格外赞赏马云的胆识和魄力。

2000年，薛中行硕士毕业，走出学校大门后，他却发现，市场上并没有这样一家机构，帮助企业家觉醒，把公司变成分享的平台，打通利用“股权分享”激励企业发展的任督二脉。因此，他决心填补中国股权激励咨询领域的这一空白。

薛中行说，他最初的想法就是做一家简单的咨询公司，能够传播股权激励的理念，“关键是让企业家有这样的意识”。

毕业同一年，在复旦科技园租下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薛中行与几个合伙人共同创办的“经邦咨询”公司起步了。

谈及公司名字，薛中行介绍说，“经邦”二字取自“经邦济世”一说，“经邦济世”正是经济学的本义。对于传播股权激励的思想，他们有一套理念，但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营销。“客户怎么来，如何吸引客户，当时我们都是

不知道的。”薛中行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思想营销出去，这是我们在大学所没有学过的，只能到社会中慢慢领悟。”

创业初期的一两年间，“经邦咨询”没有任何知名度，客户非常稀少，一度难以为继。薛中行坦言创业初期的艰难和摇摆：“我有很多次想过放弃。确实会有这样的感触，收入是不连续的，但房租、工资却是连续的，工资发不出来，生活都成困难。”

一番思想斗争过后，薛中行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公司逐渐有了一点起色。他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公司接到的第一笔生意来自浙江宁波。一家企业通过网络了解到经邦咨询公司，希望能够尝试股权激励。薛中行回忆道，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只是出现一点希望就想拼尽百分百的努力，当时沪浙之间还没有建成跨海大桥，从上海到宁波需要五个小时车程，薛中行与同事连夜赶往宁波，与对方洽谈改股方案。方案谈成后，他们收到了一笔三万元的咨询费。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每一个低谷的时候，总会有一道转折，成为薛中行坚持下去的动力。“人生充满戏剧性，但只要坚持，就会有路可走，这是一个时间问题。”43岁的薛中行比创业初期更从容笃定，他坚信社会就是这样：“只要有勇气、不动摇，有强大的意志力，或早或晚一定会成功。”



· 十七年行者无疆

薛中行在自己的微博简介中写道，“行者无疆，十七年只专注于股权一件事。”

从复旦科技园的一个小小工作室起步，经过了创业初期营销知识缺乏带来的难题，也坚韧地走过了业绩低谷时期。即使经历过自我怀疑，但是薛中行在实践中却从来没有退缩，他带领经邦咨询团队全身心投入股权研究这一项事业。如今已经奋斗了十七个春秋。

“前十五年以股权激励为本，后十五年以股权上市为本”是薛中行对经邦集团的定位。他提到，经邦集团正走在上市的路上，上市之后，一旦有资本的助推，影响力就会更大，能够推动更多企业家做股权激励和改革，从而让更多企业彻底革新自身。目前，经邦每年提供股权咨询、设计股权激励方案的企业达两百余家，每年接受薛中行及团队授课的企业家每年约一千余人次。

薛中行说，接受授课的企业家虽多，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立刻付诸实现。中国的企业家们层出不穷，这方面意识还在一点点上升。他对行业充满信心，认为股权激励设计的市场空间极其广阔。未来，社会会逼迫着这些企业家实现股权激励。

薛中行再三强调：“股权分享是一个源头。”他提到，“商业大亨”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把所有的财富都捐给慈善组织，其实就是回归到社会的做法——企业是社会共享的企业。薛中行认为，中国企业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就是从“我的企业”上升到“社会公有的组织”。

心中一番大格局让薛中行时刻充满了使命感，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做一名传授股权激励理念的教育家”。薛中行说：“毕业十多年，总觉得没有脱离复旦，脱离学校，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股权咨询的领域，但真正能帮助企业策划方案、辅助股权激励项目落地的寥寥无几。因此，薛中行将自己看成一个肩负重任的行者，一边经营公司，一边为企业家授课、分享股权激励理念。

“我们只专注一件事”，薛中行身上依然有刚创业时的那股韧性。“为什么要做很多件事呢？”他反问，“一棵树没有必要结很多种类的果子，把一件事做透、做到极致，回报就足以惊艳。”他讲到，正如孙正义最为人知的成功就是他投资了阿里巴巴这一件事情，这个社会价值并非“线性分布”，而是“幂分布”，能把一件事情坚持下来，最后做成功了，“幂增长”的价值也就实现了。

薛中行也格外庆幸自己能把手头的

这一件事情坚持下去。“十多年过去，虽然创业开头的路比较艰辛，但坚持下去，就会发现回报如此丰厚。”薛中行坦言，2000年从复旦毕业，工作比较好找，经济学院的毕业生完全可以轻松进入待遇很高的用人单位，而薛中行认为去别人的公司上班，只能按照别人的想法工作，自己想要的却是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现。于是薛中行毅然成为一片荒地的开拓者。“刚一毕业就进入企业任职的同学，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创业过，没有趁着年轻有勇气、有激情的时候孤注

一掷奋力抓住梦想。人到中年，已经拥有了一些积累，再想要抛弃掉一切尝试下海、从头开始就难了。”薛中行感叹。

他提起孩提时代读过的《小马过河》的故事，“人生就像小马过河，尽管会有很多畏惧，但还是要勇敢地去尝试。”他经常劝导后辈，世界上没有什么难事，就怕“认真”二字。中国当下的竞争要比过去激烈很多，但认认真真做事情还是有很大机会。关键是自己能把心沉下来，按照想法坚持做下去。

· 不忘初心 知行合一

1997年，薛中行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年纪轻轻的薛中行和同学们在复旦校园异常活跃，受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创办了“周易学社”，在“讲座圣地3108”组织过多场讲座。他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放任无为而治》，比较的是西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与老子“无为而治”经济理念的相似性。

二十多年后，他依然保持着每天阅读三个小时的习惯。对古代中国的哲学文化兴趣不减，潜心钻研《周易》二十余载，薛中行将其与现代商业经济的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提出了“易道管理”、“股权释兵权”、“五行管理”、“劳者有其股”、“水文化”等独到理念。

薛中行说自己是一名知识工作者，只有把时间节约下来读书，不间断地思考和学习，才能用知识折服他人。如果哪天思想上没有新收获，就会觉得这一天白过了。求知若渴，来源于大学期间教授们给薛中行留下的深刻印象。经济学院的教授在讲解专业知识时，会一并普及贯通大量人文理念，教授们宽广的知识面和厚重的文化底蕴让他钦佩不已。

但对于经济学知识的实际功用，薛中行和同学也曾有过怀疑。“很多老师教经济学，实际生活中却没有运用理论知识去赚钱，同学们中很多人就理所当然地觉得，如果不从事学术研究，学校里学的经济知识在社会上99%用不上。”薛中行说，进了大学才明白，经济学更多的是



○ 图 / 薛中行



○ 图 / 2015年经邦咨询捐赠

解释经济现象，但是却不能教会大家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赚钱，同时他也在思考，学到的这些经济学的具体知识，到底能不能去影响社会。

经历本科和硕士阶段，薛中行最终找到了答案，他觉得“经济学是真正的经邦济世、经世济民之学，做到知行合一，就可以使它发挥出价值”，在之后的人生轨迹中，薛中行更加一扫多年前“专业无用武之地”的困惑，坚定学生时代就认识到的“知行合一”的方向。

“利用在复旦学得的知识服务社会、实现价值，是我一切行动的初衷。”薛中行表示，复旦经济学院培养出的人才不应该只追求金钱价值、只考虑商业利益。就像互联网叫车软件解决了人们的出行痛点、网络电商平台满足了人们的即时购物需求一样，真正企业家的出发点一定是“利他”的。薛中行始终认为，利他是一种自然规律，而商业价值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副产品。

如今，薛中行既是经邦的董事长，又是南无拳运动的创始人，同时身兼多所院校的客座教授以及多家企业的首席顾问，但他最为看重的依然是倾注了十七年心血的经邦集团。不仅在于传递股权激励理念，更在于脚踏实地帮助企业实现落地，重塑中国企业家的思想。他把经邦看做是自己理念最直接的成果体现。

薛中行十分欣赏马克思的墓志铭——全世界的哲学家都在想方设法解释这个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薛中行认为他的追求就是改变社会，这也是他学生时代的初心。

未来他还想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凝聚起来，服务中国企业，践行慈善、回馈社会。

2015年6月，适逢经济学院恢复建院30周年，薛中行回到复旦，向母校经济学院捐赠2000万元，用于支持学院各项事业的发展。薛中行自豪地回忆道，自己一代人读书的时代正是复旦经济学领域最辉煌的时代。他在致辞中说，15年前，他刚硕士毕业就遭遇“失业”，创业艰难之际，与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的石磊老师偶遇，石磊鼓励他：“坚持在一个行业工作十年以上，才有话语权。”

薛中行如今坚持了17年。他用自己的故事激励年轻的学子们，不忘初心，知行合一，砥砺前行，才是成功者的本色。

薛

（本文系记者对薛中行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薛中行，中国股权激励第一人、中国证监会登记结算股权激励课题组组长、资深投资银行专家，经邦集团董事长；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先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尹伯成、张军教授。）